

DOI: 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5.01.010

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中国的传播研究由于长期处于学习接收阶段,对于现有的主流传播研究史中的叙事问题一直缺乏反思。但是近年来,随着对西方了解的增加,传播学界开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传播研究史进行批判。从简单的学习阶段,进入到传播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文章认为,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中,除了正面否定主流叙事中的神话外,更重要的是反思其中的叙事方式。目前的叙事存在着编年式、里程碑式、大师主导式、学派冲突式和观念统领式几种,其中渗透着乐观的进步主义与辉格解释的意识形态。要挑战这些元叙事,一个途径是采用反讽的风格,重新让无法被归入既有分类的“灰色地带”重新发言,解构现有主流叙事。如果从连续与断裂的主题来看,即是发现连续中断裂与断裂中的连续。这不仅可以让更深刻地理解外来的理论,而且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其他被遮蔽的可能性,以指导未来的传播研究。

关键词:传播研究史;传播思想史;历史叙事;灰色地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5)01-0073-08

一 从传播理论到传播思想史

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历史部分基本是千篇一律:19世纪末社会科学出现,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魔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卡茨等人提出两级传播与意见领袖,并进而由克拉帕提出有限效果论,否定了魔弹论,60年代末以议程设置为代表的宏观效果理论兴起……

但是这条看似连续的线索有太多缺失的链条。这是一个缺乏意义解释的“编年史”,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为何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这种不求甚解、似是而非的状况从课堂延续到了研究中。对西方传播研究史和研究逻辑的误读导致了大量“双重去历史化”的学术废品。^[1]这类研究由于不清楚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错误理解了其解释效力,将其普世化;同时又无视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将中国经验塞入水土不服的西方概念与理论之中,制造出一具又一具“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但是公平地说,从1978年作为学科的传播学^{①[2]}被正式引进中国大陆后,“系统了解”一直是

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成果不可谓不多。可在如何了解方面,却一直不得其法。直到最近,才渐窥堂奥。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子系统的系统式解读、把传播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90年代中期,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精神^[3],把传播研究当作客观的科学发现,以仰视立场,亦步亦趋地理解。刚经历十年学术政治动乱的新闻学界试图摆脱左的束缚,去政治化的意愿强烈,导致更像“科学”的量化研究成果被重视。与此同时,这种不加批判的科学图式将传播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学习者忽视理论的产生语境,将其结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现实,出现了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后殖民式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是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解而逐渐出现的。研究者意识到学术语境的重要性,作为十字路口的传播研究有大量资料来自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学术传统,开始将传

收稿日期:2014-12-02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J029)

作者简介:刘海龙(1976-),男,四川德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① 作为研究问题的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进入中国,但是由于我们固守施拉姆的传播学定义,竟长期忽略了上述历史。

播研究放到整个西学的理论谱系中,探索其来龙去脉以及和不同学科的隐形勾连。但是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系统理解只是为了使第一阶段的学习更加全面与深化,批判性仍然有所欠缺。

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学术语境外,社会语境更受到瞩目。研究者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前在两个阶段,西方的传播理论被看作有待学习的客观知识的话,在这一阶段,它们则被客体化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史料。知识的神圣面纱被掀去,被置于权力的透视镜下仔细剖析。以胡翼青的研究为例,如果说《再度发言:论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之作的话,那么《传播学科的奠定》则已经具备第三阶段的特征: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将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博弈做了精彩地阐述。^[4]

知识社会学曾经一度 and 传播研究走得非常近,由于主流传播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琐碎的经验研究,二者分道扬镳,但在今天它们又在传播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中重新走到一起。一旦把知识本身作为问题,传播研究便可将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于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之列。像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将也可以被视为是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的解读也可被视为受众与文本间的协商过程,传播学在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正当化也可放在传播者与学术受众关系的视角下加以解读,甚至还可以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解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收编与驯化。^[5]如此一来,传播理论的批判光芒照向自身,中西传播研究本身也可以作为传播研究反思与批判对象。这便从被动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进入到了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二 两种传播思想史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是对人类观念的历史研究。宽泛地看,它可以被视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的同义词。它们关注的都是人类思想的演变发展历程。而且观念史与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在开始出现时,都指哲学史和科学史这类研究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研究,准确地说是学术思想史。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年鉴学派、新文化史等史学思潮的影响,它们开始与文化史研究走得更近,不仅包括传统观念史的对象,还关注日常生活和非正式知识的历史。渐渐地,思想史向着思想文化史泛

化,研究对象在学术观念史的基础上大为扩展。但从历史沿革上看,思想史是由观念史逐渐扩展而形成的。^[6]除此之外,与思想史接近的还存在一个更细分化的领域——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该领域起源于德国的《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它受语言学影响较大,试图在共时的和历时的两个维度上理解某一概念的演化过程。^[7]观念与概念略有不同,按照诺夫乔伊的说法,前者是构成思想的最小的基本单元,他称之为单元-观念(unit-ideas),它是基本的、持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思想元素。^[8]而概念则是一种语言学单位。一个语词概念可能是多个单元-观念的混合物,一个观念也可能表达为多种不同的概念。此外,概念要比观念更直观和具象。观念可能是模糊的,潜藏于话语之后,而概念则是明确在场的标签、表达的工具。

具体到正在形成中的传播思想史研究,可以将其分成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是传播学术史,主要关注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发展史中的观念、概念、命题、理论及学说的演变过程,同时兼及持有思想的个人或群体(如学术派别)。除了前面提到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外^[9],詹姆斯·凯瑞对传播思想史有过一系列精彩的专论^[10]。他的学生切特罗姆的《大众媒介与美国人思想》^[11]、贝尔曼的《芝加哥学派社会思想中的传播观念》^[12]、卡蒂尔的《威尔伯·施拉姆与美国传播理论起源的观念史》^[13]对美国传播观念的起源有过专题研究。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对“传播”这一观念在西方思想界的变迁做了精彩的梳理。^[14]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到劳动》^[15]、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16]和文集《媒体与传播研究史:竞争的记忆》^[17]则是更有批判性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近些年来,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不少,主要集中在学术思想史领域,黄旦、陈卫星、吴飞、胡翼青、孙黎等皆在该领域有出色成果。

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关注学术思想,还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及其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像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讨论了新闻观念的变迁及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18],近年来黄旦教授的一系列研究也在关注中国近代以来媒介对中国人表达、思维方式及知识结构的影响^[19],拙作《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则描述了中西方宣传观念的产生及演变,重点研究了宣传将自身正当化的过程。^[20]如果我们接受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21],那么新闻史和传播史归根到底

都应该关注作为行动者的新闻及传播工作者的观念与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们的行为或者作为行为结果的媒介产品。目前这一类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未来应该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三 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受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背景下,反映从二十世纪初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22]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证据,迎合赞助商的需求。^[23]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与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24]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由于传播研究缺乏自治所导致的学理匮乏,所

以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传播学便一直处于“正当性赤字”之中。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尤其是经验学派为了肯定既有学术体制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在学术史的书写中渗入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话语层层堆积,构成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和以此为基础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不仅如此,对学术史叙事缺乏自觉的中国传播学界自己也生产了大量未经反思的学术史叙事。例如通行教材中为了论证当下合理性、对进步充满乐观的“辉格党式”的历史叙事随处可见。

四 传播学术史的叙事结构

有鉴于此,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当务之急是解构这些被神话包裹的主流宏大叙事。这些叙事中的神话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叙事的素材,包括概念、理论、人物、学派等,二是叙事结构。关于前者,近年来笔者已经做过一些个案研究,这里主要讨论之前未曾涉及的第二个问题。

关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问题,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受20世纪中期流行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叙事学的影响,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和文学的叙事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语言创作。这些修辞的结构并非历史事件固有,而是历史学家在叙述时加入的主观元素。怀特将历史中的叙事结构总结为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三个方面。^{①[25]}怀特所讨论的历史叙事偏重历史事件,学术史的叙事未必可简单挪用。然而受怀特研究的启发,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传播学术史叙事中发现类似的固定结构。总结起来,在现有传播学术思想史的编撰上存在如下五种主要结构:^②

1. 编年式结构。严格来说这类叙事还谈不上有意义的故事,它只是按时间顺序罗列重大事件,并不诠释其意义,似乎事件本身便会诉说一切。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传播学术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碎片事件简单缀连而成,这里面既看不到具体的人的行动,对于事件构成的网络关系也缺乏描述。比较典型的是大部分传播学教材中对中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叙

① 怀特的理论也受到一些学者批判,认为叙事并不是在历史编纂过程中形成,而是伴随历史事件被记录时同时就存在的共识元素,是运用“存在于未来的回溯点来回顾现在”,因此叙事与真相存在相同形态。其讨论见迈克尔·斯坦福著《历史研究导论》刘世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88页。

② 分类中的一些名称受到林丽云教授的启发。(见林丽云著《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台北远流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但研究的问题略有不同。林丽云教授针对的是传播学史的研究进路,本文讨论的是传播研究史的叙事。

述。但是即使是这种看似客观的事件排列,通常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和无意义的,它隐含着进化论和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所有被选中的事件,均与今天的现状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2. 里程碑演进式结构。这种结构与编年式结构很接近,不同的是编年式结构对事件的罗列更加全面,不仅有研究成果还有重大事件,而且叙述得比较简略。而里程碑式的结构以一定标准遴选符合某种范式的重要研究成果加以详细叙述。其代表性作品为洛厄里和德弗勒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选取了十四个具有较大影响的经验性的效果研究来展现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展历史。这种结构中的进化论意识形态比编年式结构表现得更加突出,而且有意无意地强化了经验研究的正当性。例如书中在比较经验研究与“文化批判”时指出“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然而,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26]

3. 大师主导式结构。这类叙事比较突出研究者个人在学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传播学术的发展由少数学术大师推动。他们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传播学术发展的脉络。比较典型的是施拉姆创造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叙事,将传播学的产生归结为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四人的贡献。^[27]施拉姆的弟子罗杰斯虽然并不完全认可“四大奠基人”的说法,但仍然继承了施拉姆的叙事结构,将传播学术发展化约为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忽略了社会结构和学术场域的作用。^[27]

4. 学派冲突式结构。传播研究内部分成不同的学术传统,它们在不少地方存在分歧,经常处于竞争与冲突状态。比如阿多诺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时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便是传播学史上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矛盾公开化的轶事。此外,美国学者詹姆士·凯里还建构了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芝加哥学派被哥伦比亚学派取代的叙事。^[28]

5. 观念统领式结构。这种学术史以一个观念为中心,考察其在传播研究中的表现与演化过程。典型的是约翰·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丹·席勒所写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三个研究,分别围绕着传播、劳动和批判研究三个观念重建了传播研究的历程。^[29]

以上叙事结构偏重于素材的排列方式,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的导言里还谈到了目前传播学史中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即辉格史观。这种叙事的特征是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其结果则是沾沾自喜,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①^[30]在上述第1-3类元叙事中,也多少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总的来看,这些叙事方式的主流是维护现有学术体制的合理性,强化经验效果研究与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主导地位。有个别突出冲突的叙事力图挑战现状,但也因为采取一种与主流叙事类似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在反对主流叙事内容的同时,又将要否定的对象置于中心地位,从而实质上肯定了主流叙事的正当性,并未真正打破主流叙事的霸权地位。

五 灰色地带的生命力

要真正挑战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统治,除了将它从前门赶出去外,还要防止它从后门偷偷溜回来。不仅要对其内容进行直接批判,更关键的是从根本上颠覆其叙事结构。传统主流叙事的一大特征是追求宏大叙事,以一个维度或主题统摄传播学术史的整个过程。这种历史主义的叙事把学术发展的复杂逻辑简单化为一个平面,并为其发展预设了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所有学术研究都在朝向一个方向进步,其结果就是证明当下的或者作者心目中的某个理念的正当性。除了以施拉姆为中心的经验研究的传统如此叙事,批判学派无意中也就肯定了这一策略。例如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虽然提醒读者注意过去忽略的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维度,但是却意欲以“劳动”取代之前居于统治的“效果”,以同样的逻辑排除了其他的维度。汉诺·哈特的《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则片面地理解了哲学中的“批判”概念,将其庸俗化为思维的“批判性”对传播学术史做了单维度解释。

这种把历史变成哲学或社会科学的注脚做法,最终受损的是历史的丰富性和人文关怀。对于学术史来说,回到历史,重建学术演化过程的复杂性,其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寻找历史中蕴含的其他可能性,为今天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与此同时,将学术史放在思想史下研究,在我们的头脑中复活过去学人面临的问题、困境与思考的脉络,同情地理解,把握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既是一种必要的学术训练,也丰富了当代人的学

① 胡翼青所著《传播学科的奠定:1992-1949》对此有相关阐述,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术体验。

当然, 回避体系化的叙事未见得就能摆脱宏大叙事, 除此之外还需要借助新的叙事策略帮助我们抵抗主流叙事的霸权。为此, 我更愿意尝试反讽的叙事来达到这一目标。反讽的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放弃了以简化的方式对学术史打包概括的野心, 转向寻找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 发现被意识形态掩盖或歪曲的问题, 并以此为线索, 展现整个话语系统的固有缺陷。在之前的系列研究中, 逐渐形成了一个传播学术史的“灰色地带”的概念。^①

所谓“灰色地带”, 并不是日常语言所说的“是”与“非”之间的模糊地带, 它只是一种中立的描述, 并不带价值褒贬。它是相对于之前学术史叙事中所体现的秩序感而言的。上述秩序感的获得常常建立在武断的分类体系和线性的过程描述之上, 最终产品是黑白分明、壁垒森严的僵化概念体系和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所以这里的“灰”, 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 即那些令人尴尬, 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因此对灰色地带的重新发现, 不是对传统叙事内容的直接否定, 因为如上所论, 那种方式使得被否定对象仍然居于叙事的中心, 仍然强化了其地位, 甚至肯定其叙事方式。相反, 这种取向是通过迂回的方式, 把注意力转向被忽视或收编的“异类”, 通过它们的发言, 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霸权, 找到新的话语表达方式, 从而更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

“灰色地带”不是“陌生地带”。它不是新近才被发现的(尽管它并不排除新证据), 而是我们熟视无睹, 被主流话语收编的那些部分。所以解放灰色地带的方法, 并不是像罗杰斯在《传播学史》里所做的那样, 将传播学的边界向外无限扩张, 发掘那些过去不属于传播研究的人或事件(在某些时候这种做法也是必要的), 而是回到我们熟悉的区域, 向内审视那些在传统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正如诺夫乔伊所言, 每个人或群体那里都有一些大众共享的思想默契, 因为太过理所当然, 它们甚至不会出现在文本之中。这些思潮在资质普通的学者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而那些卓越者却往往特立独行, 敢于打破这些共识, 在他们身上这些特征反而比较少。但

是在传统观念史研究中, 常常忽略了前者, 反而偏离了观念史研究的真正中心问题。^[31] “灰色地带”的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关注那些新奇的个案, 而是要反思常识, 从习以为常中发现真正的问题。

宏大叙事之所以强大, 就在于将这些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的同时, 又以含糊其辞的方式, 将其重新包装并收编, 形成让人难以察觉的连续叙事。和边缘化比起来, 收编更难觉察。因为这些特例并没有被排斥在叙述之外, 而是被嵌入既有的话语结构中, 有选择地加以重新诠释, 回避与该话语结构的冲突, 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 让曾经存在的不协调与冲突烟消云散, 世界呈现出整齐的秩序感。

因此, 要挑战宏大叙事的霸权, 首先必须打破现有的界线分明的分类体系, 采取“陌生化”的策略, 悬置成见, 将这些“特例”从“共识”和“传统智慧”中解放出来, 恢复它们被武断地归类前所具有的那种模糊的、充满歧义的、令人难以抉择的状态。这样, 那些黑白分明的界线之间灰色的部分才能重新发言, 打破既有秩序, 暴露矛盾与冲突, 让我们反思原有叙事的武断性与局限性, 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举例来说, 传播学教科书中一般都会提到魔弹论或皮下注射理论, 似乎它是传播学发展的必然阶段。但是究竟谁是魔弹论的主要支持者, 主要观点是什么, 论据是什么……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深究过。有学者发现, 传统传播学效果叙事中的魔弹论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哥伦比亚学派的经验研究者为了强调自己的发现而制造的稻草人。哥伦比亚学派为了突出自己所发现的“大众媒介效果有限”这一结论的“创新性”与“科学性”, 将之前欧洲的研究一律斥为盲目地肯定大众媒介的强大影响。从而建构了传播效果研究由魔弹论进步到有限效果论的神话。^[32]

笔者之前关于拉斯维尔、伯内斯、帕克等“熟悉的陌生人”的研究也采取了类似方法。^[33] 这些在学术史上看似地位显赫、不可缺席的学者, 却因为不符合传播学史的主流叙事, 被标签化后便置之不论。然而一旦排除刻板印象, 进入他们的思想, 之前那些似是而非的论断便顷刻崩溃, 对既有的学科叙事构成挑战。除了灰色的人物外, 还存在灰色时代。比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传播研究曾经

① 这个概念是我在《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国际新闻界, 2010年第4期第29-36页) 中灵光一现偶然提出的, 黄旦老师在提意见时指出这一概念有一定价值, 但未充分阐述。在研究帕克与芝加哥学派时, 我将这个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这篇名为《连续与断裂: 帕克与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神话》的论文将刊登于《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一度欣欣向荣,但是因为无法嵌入1978年之后新闻学者所建构的“传播学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的叙事,不符合施拉姆给中国学者圈定的传播学范畴,在主流传播研究史里,这些民国时期的社会学者和心理学者的传播研究几乎无人提及。^[2]

六 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

在探索传播学术思想中“灰色地带”的过程中,自然引出另一个重要主题:传播学术思想史中的连续与断裂问题。这里所说的连续,指的是学术思想的传承、观念的扩散,表现为学术传统、学派的家族相似。它强调绝对性,认为内部的差异可以忽略,同一性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熟悉的当下。传统的传播学术思想史研究比较侧重连续性,通常是以今天为起点,沿着发展谱系向上回溯源头。而断裂则认为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是累积性的,而是表现为一次又一次的范式革命和转型。每一次变化都是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和根本性变革,连续只是变革中的小插曲。它更强调相对性,认为研究应该更关注差异而非同一,古与今的异远远大于同。这一主题由于库恩、福柯等人的提倡,亦成为与连续性并立的主题。^[34]

然而学术思想的发展并非线性的连续或断裂,其复杂性与丰富性远超过简单的连续与断裂。二者常常缠绕在一起,呈现辩证的关系,表现为连续中的断裂、断裂中的连续。将连续或断裂绝对化,则破坏了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连续中的断裂与断裂中的连续的研究,突出的就是思想史发展的特殊性。如舒德森对于美国新闻史的考察发现,尽管存在连续的新闻工作传统,但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在新闻观念和格式上悄然发生了一场由讲故事到提供信息的革命,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新闻的客观性与专业主义逐渐兴起。^[18]这是连续性之中存在断裂的典型示例。

而著名历史学家贝克在研究启蒙时期思想时发现,18世纪哲学家们表面上否定中世纪宗教,但实际上在他们建构起来的不过是“天国之城”的俗世版本,其论证方式与他们所反对的中世纪宗教存在相似的非理性的独断特征。^[35]余英时在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中也发现,在从宋学到清朝朴学的表面断

裂中,存在“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宋学中存在“尊德行”与“道问学”两个传统,清朝朴学与“道问学”之间存在内在继承关系。^[36]这些都是思想断裂之中发现连续性的例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所说的“灰色地带”就是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处的连续之处。对于它的研究同样会增加我们对于传播学术思想发展的复杂性的认识。例如大部分传播学史都会强调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但是对游走于两者之间的那些“灰色人物”却缺乏重视。拉扎斯菲尔德的亲密合作伙伴默顿是当时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37]拉扎斯菲尔德的第二任妻子赫佐格在研究日间广播剧的女性听众时抨击商业广播对女性的控制与利用,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38]甚至连拉扎斯菲尔德本人也曾经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与默顿合作的论文中,也接受默顿对于美国媒体商业体制的批判。^[39]而阿多诺虽然反感哥伦比亚应用社会局故作神秘的量化效果研究方法,但是他到了美国西海岸之后,却和那里的心理学家合作,开展威权人格的量化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40]这些事实说明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之间的边界并非像后来者所想象的那样壁垒分明,只要悬置判断,进入这些灰色地带,便会让人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吸引我们一探究竟。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传播研究中的“芝加哥学派”,这里面既存在连续中的断裂,也存在断裂中的连续。首先所谓的传播学芝加哥学派本身就抹杀了成员之间的差异。在核心成员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①中,前三者比较接近,都是通过思辨的方式强调传播行为在自我与社会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帕克与他们的相似性远小于差异性。他有十一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偏向于经验性的研究,在强调传播的社会整合作用的同时,在关于移民报刊的研究中还关注了传播的社会分裂作用。帕克在移民报刊的研究中,将报纸看成同化欧洲移民的工具,与杜威等人主张的传播在建设民主社群中的论坛功能背道而驰。在后来者建构的传播芝加哥学派之中,由于帕克的存

① 这四人是切特罗姆、罗杰斯、凯里和胡翼青四个研究者在传播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共同提及的人物。见丹尼尔·杰·切特罗姆著《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罗杰斯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Carey J. W.,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edited by Dennis E. E. Wartella E.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1996: 21-38; 胡翼青著《再度发言: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在而产生了断裂。其次,以詹姆斯·凯里为首的学者为了批判以管理研究和效果研究为特征的哥伦比亚学派,援引芝加哥学派作为武器。因此从一开始,芝加哥学派便被塑造成一个被主流研究排斥和遗忘的断裂。然而凯里忽略了帕克的研究同样具备不少和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相似的特征,如对策式研究、功能主义、强调媒体的效果与控制等。^[41]因此当把帕克看作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时,就会发现这两个学派并不存在截然对立与断裂,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传播学术思想中灰色地带的发现与解放,有助于打破以今日为标准理解历史的那种辉格解释,恢复传播思想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它的副产品便是可以给当代学者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思考另外一种可能的发展路线。当我们了解到20世纪前半期社会学对于传播现象的研究及特定问题时,对于过去关于中国传播学发展史中的许多常识就会产生怀疑,并对产生过萌芽但却未充分发展的部分提出新问题。传播思想史最终会照亮未来的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 [1] 许纪霖, 罗岗. 启蒙的自我瓦解: 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333.
- [2] 刘海龙. 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1): 21-36.
- [3] 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 [4] 胡翼青. 再度发言: 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播思想[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胡翼青. 传播学科的奠定: 1922-1949[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
- [5] 刘海龙. 寻找听众: 中国传播研究的需求与使用[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5): 71-77.
刘海龙. 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J]. 国际新闻界, 2008(7): 5-10.
刘海龙, 黄雅兰. 试论“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的语境变迁[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2): 110-118.
- [6] Kelley D R.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Ideas to Meanings [M]//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Foot S. and Partner N. F. 2013: 81-92.
- [7] 伊安·汉普歇尔-蒙克.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M]. 周保巍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8] 诺夫乔伊. 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M]. 张传有, 高秉江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
- [9] 罗杰斯.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 殷晓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0] Munson E S, Warren C A. James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 [11]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 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 曹静生, 黄艾禾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 [12] Belman S L.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 [D].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 Champaign, 1975.
- [13] Cartie J M. Wilbur Schramm and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 history of ideas [D].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1988.
- [14] 约翰·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 传播思想史[M]. 何道宽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15] 丹·席勒. 传播理论史: 回归劳动[M]. 冯建三, 罗世宏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6] 汉诺·哈特. 传播学批判研究: 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 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7] Park D W, Pooley J.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18] 迈克尔·舒德森.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M]. 陈昌凤, 常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9] 黄旦. 耳目喉舌: 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J]. 学术月刊, 2012(11): 127-145.
- [20] 刘海龙. 宣传: 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 [21]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 张文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302-303.
- [22] Pooley J.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 //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edited by Park D W, Pooley J.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8.
- [23] Gitlin T.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J]. Theory and Society, 1978, 6(2): 205-253.
- [24] 刘海龙. 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J]. 国际新闻界, 2008(7): 5-10.
- [25] 海登·怀特. 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6] 洛厄里·德弗勒.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M]. 第3版. 刘海龙,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66.
- [27] Chaffee S H, Rogers E M, Schramm W.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28]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丁未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29] Carey J W.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 //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Dennis E E ,Wartella E.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1996: 21 - 38.
- [30]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历史的辉格解释[M]. 张岳明, 刘北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31]诺夫乔伊. 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M]. 张传有 高秉江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19 - 20.
- [32]Lubken D. Remembering the Straw Man: 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Hypodermic [M] //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edited by Park D W ,Pooley J.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 2008.
- [33]刘海龙. 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J]. 国际新闻界. 2009(2) : 9 - 14.
刘海龙. 宣传的理由: 重读伯内斯的《宣传》[J]. 国际新闻界 2014(4) : 32 - 41.
- [34]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35]卡尔·贝克尔.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 何兆武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36]余英时.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M] //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37]伊莱休·卡茨.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M]. 常 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2 - 23.
- [38]Herzog H. On Borrowed Experience [J].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41 ,11(1) : 65 - 95.
- [39]莫里森. 寻找方法: 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Lazarsfeld P F ,Merton R K.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M] //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edited by Bryson L.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 [40]阿多诺. 权力主义人格[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2002.
- [41]罗伯特·帕克.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M]. 陈静静 展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Emancipating the Grey Zone: Reflection on the Narration in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IU Hai - l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nc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has long been at the stage of reception ,the narration of current mainstream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seldom question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acquaintance with western world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China began to apply critical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ociology to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refore ,their study evolves from passive learn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reflective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achievemen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depends more on reflecting the narrative modes in mainstream narration than directly denying the myths in it. The meta - narration of mainstream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an be categorized as chronicling style ,milestone style ,masters style ,contesting - schools style and single - idea style ,most of which were saturated with optimistic progression and whiggish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challenge these meta - narrations ,a promising approach is using irony. It will make the odd “grey zone” ,which is hard to be cataloged ,speak up again and ridicule the logic of mainstream narration. If interpreted from language of continuity and rupture ,the grey zones c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rupture in continuity or continuity in rupture. This approach will not only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mported theories ,but also enable us to discover other ignored possibilitie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enlightening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narration of history; grey zone
(责任编辑 李雪枫)